

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论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

汤景泰 史金铭

内容提要：为破解美国对华舆论战的内在机理，需要重点从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两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入手，分析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核心话语是话语的中心思想与主题凝练，具备符号化的特征，会成为一种所指卷入话语权力的运作。作为话语在思想层面的“内容建构”，核心话语作用的发挥需要话语框架提供底层诠释体系与合法化机制。根据美国涉华舆论议题，可以提炼出四种核心话语：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及黄祸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图谱，可以解析出三种话语框架：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保守主义话语框架以及进步主义话语框架。尽管三种话语框架背后的价值逻辑存在差异，但共同构造出一个意识形态方阵，将中国“他者”化，为“污名化”中国提供认知框架与价值支撑，并为美国及其利益相关者建构集体认同。中国要与之进行有效的话语竞争，需警惕“话语陷阱”，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认可的话语框架提炼出中国的核心话语，另一方面也要基于更丰富的价值模型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元的话语框架，推动国际话语权的公平分配。

关键词：核心话语 话语框架 涉华舆论 话语建构 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中美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美方对华大打舆论战，通过一系列手段占据舆论高地，试图赢得其国内民众和国际盟友的支持，进而给中国制造压力。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在2020年14个经济发达体对中国看法的调查中，有2/3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持消极态度，负面意见达到12年来的最高点，其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一年中上升了13个百分点^①。由此可见，不对等的传播权力使中国承受着美国媒体和政客“制造舆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我们亟需深入认识其内在机理进而寻求破解之道。

国际政治在冷战后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②，一旦某种话语获得主导性的权力地位，它就能通过话语的压制和建构功能为其价值取向披上“合法外衣”^③。也就是说，美国舆论针对中国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危机中的风险沟通与效果评估研究”（20AXW008）的研究成果。

①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2021年5月26日。

② 陈小鼎、王亚琪：《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

③ 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

造的说辞,即便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但依然可以获得广泛的传播与信任。因此,从话语维度考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涉华舆论建构的内在机制,有助于破解美国“话语强势”的密码,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述评

话语不同于广义的语言,二者的区别在索绪尔(Saussure)关于“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的辨析中已初见端倪^①,古典意义上的“话语”是语言的一般形式,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话语是具有连贯语义和完整话题的语句集合,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互动产生,具有信息传递和互动功能^②。但福柯(Foucault)认为结构主义割裂了语言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主张从话语反推语言使用的社会规范,致力于分析话语形成的社会历史性,尝试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认为话语是整体“陈述”的“宏伟显现”^③。后结构主义学者充分吸收福柯的思想,把话语引入政治学研究,将话语看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通过揭示社会规范对话语的影响来重新解释文本,尝试围绕话语、文本间的关系来理解权力、知识和身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④。此后,话语研究形成了审视社会现实和问题的“建构主义视角”——即话语同时指代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结果,是制造并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

国际社会权力分配的意义由国家利益决定,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建构起来的^⑤。权力通过话语实践产生社会意义,其所建构的物质性结构是国际体系的表层推力,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规则是被权力掩盖的深层动力,而话语则是连接观念与权力的媒介工具。不少学者都基于这一理路,研究政治话语如何卷入权力运作,并探讨其在建构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的作用。例如,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E. Goddard)认为政治谈判话语通过建构身份认同、民族情感来影响领土主张的合法性,并且会带来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⑥;也有研究者探讨话语在国际力量制衡方面的作用,如托马斯·里塞(Thomas Risse)发现各利益主体在政治话语辩论过程中可以反思利益得失和身份认同,从而促进国际关系平衡^⑦。

在西方,有不少学者关注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涉华舆论倾向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受冷战影响,“反共主义”话语长期主导着美国涉华舆论^⑧。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更是明确指出,“反共理念”已成为美国媒体的五大过滤机制之一,基于该理念形成的信仰所带来的过滤作用影响深远^⑨。这并非危言耸听,有研究就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纽约时报》的报道即使承认中国政治经济实力,但“仇华的维度仍然是一个组成部分”^⑩。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第24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詹姆斯·保罗·吉:《语篇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第1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29页,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⑤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1页,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

⑥ Goddard Stacie E, “Uncommon Ground: Indivisible Terri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1, 2006.

⑦ Risse Thomas,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2000.

⑧ Michelle Murray Yang, “Guilty without Trial: State-Sponsored Cheating and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Women’s Gymnastics Competi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7, No. 1, 2014.

⑨ 爱德华·S·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第25—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⑩ Kent A. Ono, Joy Yang Jiao, “China in the US Imaginary: Tibet, the Olympics, and the 2008 Earthquake”,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Vol. 5, No. 4, 2008.

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主要成果多是依据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揭露西方“妖魔化”中国的问题。这些研究对西方舆论的多种策略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但忽略了对西方舆论偏见背后支配规律的探讨。福柯曾警示,不要寄希望于话语可以直接透露其背后的权力运作,而要从话语的“技术性分裂”及“战略整合”层面进行解析^①。因此,要破解美国涉华舆论的建构密码,还是需要从舆论的话语表征、建构逻辑及其作用机制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考察。

二、美国舆论涉华议题的核心话语

从话语研究的理论视阈来看,话语是关于社会观念再生产、传播的实践,探寻话语建构的过程,需要由表及里对其解构,透析话语的核心内涵是出发点。由此,需要引入核心话语的概念。核心话语是话语的中心思想和主题凝练,并且具备符号化的特征,会通过话语实践产生,服务于某一话语实践目的。简而言之,核心话语本质上是话语的“内容建构”,会在认知维度上卷入权力的运作。提炼美国涉华舆论的核心话语,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和社会历史现状,从舆论关注的议题和论调中总结其核心主张。本研究将美国涉华舆论总结为四种核心话语: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和黄祸论(见表1)。

(一) 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目前美国对华舆论的主论调。这一论调的鼓吹者认为国际关系非友即敌、二元对立,由此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提升,该论调在经济、科技、国际安全、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对中国展开全方位攻击和污蔑。

经济层面的中国威胁论主要对中国经济体制展开攻击。有学者把中国的国企描绘成“控制某些自然资源的工具”,并污蔑说在有中国参与的世界贸易竞争中,西方跨国公司的对手是中国“整个国家”^②。在科技层面,美国指责中国是国际信息安全的破坏者。美国国家反情报总监办公室抹黑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活跃、最持久的信息间谍犯罪者。”^③国防安全层面,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和地缘政治发展都被美国视为一种“安全威胁”。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时,就宣称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造成威胁。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威胁论近年来更是甚嚣尘上,弥漫在学界、文化界、科技界等多个意识形态相关领域。例如,美国一些政要声称孔子学院推进了中国的“政治目标”,并威胁到“学术机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④。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问题还和科技问题杂糅在一起。例如,一些美国政要宣扬华为、Tik Tok 等中国企业是中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武器”,并寻求对其进行制裁^⑤。

(二) 中国责任论

“中国责任论”是“中国威胁论”在行动层面的升级,这一论调表面上承认中国发展成就,但

①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ume I*, New York: Vintage, 1990, pp. 92—116.

② Kurlantzick Joshua, *State Capitalism: How the Return of Statism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 “Foreign Spies Stealing US Economic Secrets in Cyberspa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Foreign Economic Collection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 2009—2011”, p5, October,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720057>, 2021年4月13日。

④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Confucius Institute U. S. Center Designation as a Foreign Mission”, August 13,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e.gov/confucius-institute-u-s-center-designation-as-a-foreign-mission/>, 2021年5月26日。

⑤ Charles E. Schumer, Tom Cotton, “A TikTok Letter”, October 23,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imo/media/doc/10232019%20TikTok%20Letter%20-%20FINAL%20PDF.pdf>, 2021年9月23日。

实质上是直接将中国定性为“有责任的一方”,希望中国承担额外的国际责任。中国责任论的核心逻辑有两条,一是利益相关逻辑,二是有罪推定逻辑。

利益相关逻辑是对中国在义务层面的要求,认为中国得到世界认可的发展机会意味着责任,中国必须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该论调盛行于21世纪初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时期,有捧杀中国的倾向。有罪推定逻辑则指责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对世界资源的“侵犯”之上。在这种话语逻辑下,相关舆论重点是针对气候、环境等议题以相关国际法或道义之名对中国进行问责。某些美国政客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有资格获得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的资助,享受着与应有的责任不相符的福利^①。同时,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等美国政客以中国“隐瞒疫情”“故意散播病毒”等理由要求联合国“必须让中国为疫情流行负责”,并让中国对世界各国做出赔偿^②。

(三) 中国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即以西方为标杆,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治理体系贴上落后的标签,然后推论出中国即将崩溃。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崩溃论至今已经形成了四波热潮^③,相应地对应中国崩溃论的四个维度。

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国家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而走向崩溃。第二波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1年左右,亚洲金融危机引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判断^④。第三波“中国崩溃论”大致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爆发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前后出现,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社会即将全方位溃败。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短暂下滑,彼时互联网的兴起又带来许多舆情事件,社会矛盾凸显,西方势力企图借互联网把“颜色革命”引入中国,由此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终将走向溃败。第四波即2020年至今,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崩溃论”卷土重来。西方主流媒体充斥对中国的负面分析,认为随着这场疫情,“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即将到来^⑤。

(四) 黄祸论

“黄祸论”(Yellow Peril)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为掩盖殖民行径而创造的针对亚洲的污名化言论。“黄祸”表示一种外来族群的威胁,其核心在于将东方人视为西方权利的剥夺者^⑥,并将对国家行为体的偏见上升为种族偏见,本质上属于“威胁论”,但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故在此专门列出。目前美国的“黄祸论”主要表现为瘟疫种族化、文化妖魔化等言论,由此展现出一种病态的“排华”现象。

① Valerie Richardson, “China Poised to Profit under Biden’s Energy plan, Paris Climate Deal Reentry”, October 27,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oct/27/joe-biden-energy-plan-paris-climate-deal-reentry-w/>, 2021年5月26日。

② Quint Forgey, “Trump: U. N.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Pandemic”, *Politico*, September 22,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9/22/trump-condemns-china-on-the-world-stage-419908>, 2021年5月26日。

③ 张维为、郑若麟:《这就是中国》第81集:《“中国崩溃论”的崩溃》,2020-12-06,观察者网, https://www.observersnews.com/ZhangWeiWei/2020_12_06_573629_2.shtml, 2021年9月29日。

④ Goldstone Jack A,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5—53.

⑤ Ishaan Tharoor, “China’s Chernobyl?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Leads to a Loaded Metaphor”, February 12,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2/12/chinas-chernobyl-coronavirus-outbreak-leads-loaded-metaphor/>, 2021年5月26日。

⑥ Franck Billé, Sören Urbansky, *Yellow Perils: China Narrativ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pp. 246—266.

瘟疫种族化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将疾病赋予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称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些美国政客、媒体或社交网站用户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功夫流感”(kung flu)等歧视性词语,借疫情散播反华情绪;其次是抨击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卫生文明背道而驰,如部分人士指责中国的农贸市场为病毒提供滋生场所等。

文化妖魔化的典型表现是将美国文化描述为唯一合理、先进的文化,并且以自身文化为标准,曲解贬低中国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当性。例如,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对权威的服从,进而以此整体贬低儒家文化的价值。某国际品牌甚至直接在广告中公开嘲弄调侃中国人“起筷吃饭”的日常饮食行为。

表1 美国涉华舆论的核心话语

核心话语	延伸话语	主要关注问题	代表人物
中国威胁论	经济威胁论	国家资本主义	Janet Yellen(美国现任财政部长)、Mike Pence(美国前任副总统)、Daniel Kurtz-Phelan(《外交事务》杂志编辑、美国前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
	科技威胁论	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	Wilbur Ross(美国前任商务部部长)、Robert Lighthizer(美国前任贸易代表)、Adam Segal(美国外关系委员会的数字和网络空间政策计划的负责人)
	地缘政治威胁论	“一带一路”、军事现代化	Morgan Ortagus(美国前任国务院发言人)、Robert O'Brien(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
	意识形态威胁论	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	Joe Biden(美国总统)、Antony Blinken(美国国务卿)、Jake Sullivan(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Sophie Richardson(美国现任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John Bolton(美国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中国责任论	利益相关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巴黎协定	Condoleezza Rice(美国前任国务卿)、Robert Zoellick(美国前任副国务卿、前美国贸易代表)
	有罪推定论	气候问题、能源问题、新冠肺炎疫情	Kelly Craft(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Avril Haines(美国国家情报总监)、John Kerry(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Jennifer Hillman(美国贸易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高级研究员)
中国崩溃论	体制崩溃论	社会矛盾问题、宗教信仰问题	Stephen Kevin Bannon(美国前任白宫首席策略长)、Robert O'Brien(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Jerome A. Cohen(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职研究员)
	经济崩溃论	贫富差距问题	Ian Bremmer(美国政治学者)、Yanzhong Huang(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生活环境崩溃论	环境污染、公共卫生问题	John Kerry(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黄祸论	瘟疫种族化	新冠肺炎疫情	Lindsey Graham(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文化妖魔化	文化输出	Mike Pompeo(美国前任国务卿)

三、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框架

核心话语总是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认知,需要依附于一套附属于权力或价值观的底层诠释体系,对这一体系进行考察需要借助认知心理学中“框架(frame)”的概念。“框架”一词可溯源至人类学家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有关“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研究,框架即元传播中的信息符号诠释规则^①;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进一步提出,框架是一个共同建构的过程,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变化并被塑造^②。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将“框架”视为“认知无意识”环节对话语认知过程进行解释^③,这种“无意识”是国家或利益集团为维护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而长时间建构的思维惯性,可以帮助人们通过推理和常识来认知话语。因此,话语框架就是话语背后的价值观凝聚,是一种通用的话语编码与解码机制,被话语主体设定并用来解释和讨论公共事件的认知框架。

意识形态在建构与激活话语框架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话语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叠瓦状的(imbricated)结构,话语本身就与意识形态相勾连,二者不是先后或因果关系,而是共生同构关系。意识形态是话语框架的价值支撑,话语中也存在一种预构(preconstructed)要素,以便对意识形态中的固有意义进行询唤(interpellation)^④。因此,探讨美国涉华舆论中的话语框架需要在美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中考察。

就美国意识形态图谱来看,自由主义的代表民主党和保守主义的代表共和党在指导思想上都出现极化趋势,并分别朝着左翼民粹化和右翼民粹化发展,使得原本就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复杂^⑤。莱考夫根据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世界观差异总结出“严父”和“养父”两种道德体系,投射到政治领域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思维^⑥。根据莱考夫用价值看待政治图谱的视角,美国经济学家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从道德观念角度总结出三种美国政治语言:以“压迫——被压迫”为观念轴心的进步主义语言;以“文明——野蛮”为观念轴心的保守主义语言;以“自由——强迫”为观念轴心的自由主义语言。同时,克林指出,政治立场是由简化的观念框架驱动的,每一种政治事件都可以沿袭不同的观念轴心得到论证,从而让各自的政治群体获得道德优越感,并强化自身立场^⑦。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探寻美国舆论涉华议题中的话语框架,也需要从美国社会思潮的分野中入手。本文沿用克林的话语框架分类思路,结合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认为美国涉华舆论依赖不同意识形态引领下的三种话语框架: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保守主义话语框架、进步主义话语框架(见表2)。

(一)以“自由-强权”的对立建构自由主义话语框架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⑧。美国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在

① Gregory Bateson, *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1972, pp. 267—296.

②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6.

③ 乔治·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第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 Pêcheux Michel,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 113—115.

⑤ 佟德志:《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及其根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⑥ George Lakoff, *Moral Politics: 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283—322.

⑦ Kling Arnold, *The Three Languages of Politics: Talking Across the Political Divides*, Washington, D. C.: Cato Institute, 2017, pp. 8—25.

⑧ 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中,自由、平等是合法的价值判断,强权则是其对立面。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主张主要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其主旨在于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 and 思想体系,其基本原则简而言之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西方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发展国企以及维护经济主权的种种举措,违背了自由主义经济基本原则,因而衍生出诸多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

政治民主化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的价值诉求。冷战结束后,美国实力超群,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试图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制国家,同时发展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机构。但却违反主权原则,并倾向于通过战争输出自由、“保护人权”,结果其实质就变成了“自由主义霸权”,即基于美国模式强制性重塑世界^②。例如,美国常以所谓的“人道主义道德”为由,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下,美国舆论通过“自由-强权”对立的策略,衍生出中国“经济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等核心话语。

(二)以“文明-野蛮”的对立建构保守主义话语框架

不同于自由主义将个人权利和自由置于价值观中心,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相信社会秩序依赖于道德基础,崇尚传统、制度、习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③。保守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美国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等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

在政治层面,保守主义奉行精英主义,站在自身价值观的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中国无视国际秩序。在经济层面,保守主义奉行的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在美国优先的基础之上,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保守主义者坚持“长臂管辖权”原则,倾向于迫使外国按照美国法律行事,对他国事务进行司法管辖。在文化层面,保守主义坚信美国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倡导一元文化论,将美国文化演绎为普世的“权威”文化,认为任何与美国文化相悖的文化意识形态最终会走向崩溃。

保守主义话语框架利用美国至上等观念,基于“文明-野蛮”对立的价值轴心,利用认知的二元对立结构,将中国文化“妖魔化”,论证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文化崩溃论等核心话语。

(三)以“压迫-被压迫”的对立建构进步主义话语框架

进步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承认阶级的存在,但同时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统治阶级在阶级平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进步派的核心价值观是负责、有爱心的“共同责任观”,强调机会平等、社会共情和多元公正,强调政府有效建制的合法性和民主性^④。

在进步主义的价值体系下,弱势群体往往是被压迫的一方,而掌握权力者是压迫者,由此建构出以“压迫-被压迫”为价值轴心的话语框架。进步主义者主张用政府的有效建制为全社会带来福祉,一旦社会出现矛盾,则会怀疑政府的治理能力。进步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激进”

①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第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③ 乔治·莱考夫:《道德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如何思考》,第13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④ 乔治·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第139—14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色彩,在程序和结果层面质疑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夸大收入差距,将中国政府塑造为一个压迫者的形象。“黄祸论”“人权威胁论”等核心话语往往在进步主义话语框架中进行论述。

表 2 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框架

话语框架	核心观念	涉华舆论中的核心话语
自由主义话语框架	经济上反对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威胁论
	政治上强调追求个人权利	意识形态威胁论
保守主义话语框架	经济上主张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威胁论、科技威胁论
	政治上主张精英政治、美国优先	地缘政治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
	文化上主张文化一元论	文化崩溃论、文化威胁论
进步主义话语框架	社会经济进步	政治崩溃论
	身份政治进步	社会秩序崩溃论
	环保主义进步	环境崩溃论、黄祸论

四、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

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并不是完全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需要以整体思维去理解的建构关系。话语框架起到“锚定”核心话语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某一契合点,双方协同运作才可发挥作用。核心话语在国际社会中表现为权力决策下的利益判断,而话语框架则是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凝聚,核心话语和话语框架分别构成舆论话语竞争的言语表征和底层逻辑。

(一) 美国涉华舆论核心话语的合法化建构

话语框架对于核心话语的锚定作用主要涉及合法化建构的问题。合法化(legitimization)是通过语言手段证明某事合法性的方式和过程^①,其内涵是在广义层面上塑造符合话语框架的意识形态立场,而非狭义上对于法律道义的尊崇。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合法的共识必须在话语逻辑中得以阐明,通过话语形成的意志才具有合理性^②。同理,核心话语只有依附在话语框架内才可以得到合法性验证。因为舆论话语框架的激活首先基于观念,其次才是事实。从具体实践来看,在国际传播中,一国公众缺乏对他国事务的直接认知,对于国际舆论的接受更依赖于提供合法化机制的话语框架,而非事实逻辑。

在具体的合法化策略层面,范·利文(van Leeuwen)基于公共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总结出四种“合法化话语”策略:权威合法化(authorization)、道德评价合法化(moral evaluation)、证据合法化(rationalization),以及寓言合法化(mythopoesis)^③。范·利文后来对该策略框架进行修正,将寓言合法化替换为规范合法化(normalization)、叙事合法化(narrativization)^④。接下来,我们通过分析合法化策略在具体话语框架中的应用,来考察话语框架与核心话语的联结机制问题。

“权威合法化”指援引权威人士有说服力的观点,或者建构权威惯例,以此来掩饰推理逻辑

① Reyes Antonio, “Strategies of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Words to Actions”, *Discourse & Society*, Vol. 22, No. 6, 2011.

②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③ Theo Van Leeuwen, “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Vol. 1, No. 1, 2007.

④ Theo Van Leeuwen,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05—123.

的漏洞,从而论证论点的合法性。保守主义宣扬的精英思维试图利用权威合法化重申美国单边主义的合法性,将“美国至上”的传统道德权威建构为美国甚至世界的集体权威,而一切对美国发展产生威胁的事情都是非法的、野蛮的。例如,在保守主义话语框架内,美国政治学家马修·克罗尼格(Matthew Kroenig)援引经济学家“开放的市场往往和自由的政治携手并进”“民主国家更有可能遵守国际经济协议”等论调,通过权威合法化论证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权的合法性,直接将中国置于合法权威的对立面,污蔑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和科技竞争^①,但是对自由市场的运作机制、适用条件则避而不谈。

“道德合法化”指凭借自身奉行的价值观或道义准则对事物进行评价,是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建制问题惯用的合法化策略。道德合法化建立在一套道德评判标准的基础上,强化涉华舆论中与自由平等、反压迫等价值观念相关的部分,给中国贴上“独裁和专制”的标签,激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话语框架,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等核心话语提供合法性支持。例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Kelly Craft)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针对中国的讲话,就运用道德合法化策略,强调世界和平需要“修复建立在人权、民主原则和法治基础上的多边体系”,建立自由主义联盟^②。

“规范合法化”也称“程序合法化”,指诉诸常规规范或行为来进行论证。与道德合法化类似,规范合法化首先基于一套公认的行为规范。但是在美国的舆论合法化建构过程中,这套行为规范往往基于美国的单方面认知。例如,美国通过建构自由经济的合法地位,指责中国的国家权力介入国际经济竞争是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破坏。另外,进步主义也通过规范合法化策略,将中国现实与政府治理程序割裂开来,夸大收入差距,通过植入“压迫-被压迫”的认知框架,攻击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

“叙事合法化”指的是通过讲述富有寓意的故事,基于“演绎-推理”的逻辑论证有寓言意味的社会叙事。从具体策略来看,就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通过讲述警示性或激励性的“故事”,暗示今天的问题是过去的原因造成,或若不采取措施则会产生后果。虽然假设不一定会出现,但是在特定的话语框架内,以故事化的陈述方式强调价值观的对立,这些后果就似乎顺理成章地发生。例如福山(Fukuyama)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上就是运用叙事合法化,进行“寓言”式的假设,结合“美国至上”“美国优先”等价值观前提,输出保守主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观。叙事合法化策略通过基于“假设”的叙事合法化策略,以“故事”先行而非“事实”先行,激活了保守主义价值观,并诉诸恐惧,规避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从而论证中国威胁论、中国文化崩溃论等核心话语。

“证据合法化”指将行动或决断表现为一个基于事实推理的理性过程,具体策略是利用单方面的信息来曲解事件真相,营造出证据合理、目的合理、过程合理的假象。例如,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追责论中,先是捏造中国瞒报信息、拒绝与国际合作等虚假信息,建构“事实理性”;然后引入一项跨党派决议案,要求追责中国,建构“程序理性”;最后再以向中国追责对中美债务问题有利的理由,实现“目的理性”^③。这一论证过程实

① Matthew Kroenig,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Rivalry: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US and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08.

② Kelly Craft, “How Team Trump is Fighting China’s Ploys to Control the UN”, October 21,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nypost.com/2020/10/21/how-team-trump-is-fighting-chinas-ploys-to-control-the-un/>, 2021年5月26日。

③ Hannah Bleau, “Rep. Jim Banks: ‘Demand Reparations’ from Communist China for Coronavirus”, March 17,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eitbart.com/politics/2020/03/17/rep-jim-banks-demand->, 2021年11月3日。

际上是在保守主义奉行的“美国优先”价值观层面,论证“中国追责论”的合法性。

合法化策略的目的不仅是在话语框架内论证核心话语,更是为了输出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与核心话语通过合法化策略联结,引导受众进行价值观的判断。不仅如此,框架的激活还是一个基于观念的建构过程,在具体的合法化实践层面,会综合使用多种策略,来达到合法化的目的(见表3)。从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框架来看,尽管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进步主义话语在价值观层面存在分歧,但将视野放置在整个国际社会,可以发现各个话语框架指向的核心话语都致力于将中国塑造为敌对的“他者”。由此,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框架就在这个合法化建构过程中重申了核心观念逻辑,推动着国际社会认知朝着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表3 美国涉华舆论的合法化策略

合法化策略	侧重点	主要应用的话语框架	主要论证的核心话语
权威合法化	弱化客观缘由,强化集体权威	保守主义话语框架	中国威胁论
道德合法化	主观评价为先,强化情感联盟	自由主义话语框架、 进步主义话语框架	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黄祸论
规范合法化	忽略规范适用性,强调美国霸权	进步主义话语框架、 自由主义话语框架、 保守主义话语框架	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
叙事合法化	善用演绎推理,诉诸恐惧情绪	保守主义话语框架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证据合法化	选择性挑选事实,实现表面理性	自由主义话语框架、 保守主义话语框架	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

(二) 美国涉华舆论话语的“意识形态方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法化实质上是在观念层面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意识形态建构,而其目标则是形成“意识形态方阵”。范·迪克(Teun van Dijk)从话语、认知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将话语合法化的表现结果归纳为“意识形态方阵”(the ideology square),即话语双方在博弈过程中不断强调合法化的“自我”和非合法化的“他者”^①。基于话语建构逻辑层面的思考,我们将意识形态方阵的形成机理归纳为两个过程,首先是“标定”,即从话语上将目标对象标定为“他者”,并基于意识形态立场为双方打上标签;其次是“拒斥”,即形成关于“自我”的集体认同,从而实现目标“他者”的否定。

话语的合法化策略参与了标定“他者”的过程,但完整地构建意识形态方阵还需分析话语如何借助集体认同实现“拒斥”的过程。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国际关系中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由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这四个主变量推动^②。相互锚定的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劳动”(ideological labor),共同对这四个变量产生相应的影响。其中,相互依存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客观原因,同质性指的是国家作为行为体在类别身份上的相似性,共同命运属于一种对外来威胁恐惧的主观意识,自我约束则是行为规范层面的认知。自我约束可以作为一种行为实践变量,实际上受到其他三个变量的影响。因此,我们重点探讨话语对相互依存、同质性以及共同命运这三个变量的观念建构。

① Teun van Dijk,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 Oxford: Blackwell. In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1998, pp. 21—63.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4页,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

同质性是指国家作为行为体在类别身份上的相似性。它弱化了国家间的差异,也相应增加了利益趋同性。在同那些与美国文化价值整体相似的国家行为体交往中,自由主义话语框架和保守主义话语框架重申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还唤起西方国家的集体意识,建构西方国家共同体。

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指的是国家之间的选择会面临相同的结果,往往源于国际交往产生的信任感。信任在交往过程中可以优先建立起来,话语框架作为话语的底层价值逻辑,可以在观念体系中创造出相互依存的预先呈现,产生“迅速信任”或“诱发性信任”的状况。相互依存可以弥补同质性的缺失,例如,进步主义话语框架中的阶级平等、反对压迫等观念,与发展中国家追求国际地位平等的诉求相一致,借助进步主义价值观可以增加其对美国的信任感,营造相互依存的局面。

共同命运属于一种对外来威胁恐惧的观念认知,可以作为一种“共有知识”在内化的过程中推动集体认同的形成^①。共同命运的建构,可以抵消部分国家间因同质性缺乏、相互依存程度低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美国频频以全球环境保护、人权治理为由,推动有机含量标准认证(OCS)、化学物质零排放认证(ZDHC)、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建立,并利用国际组织的权威和规范对中国作出“非法化”评判,并将中国建构为威胁者的形象。

综上,我们就可以从过程角度解析出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如图1)。首先,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通过合法化策略进行互构,标定价值观的对立面。其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话语框架从价值观维度重申了西方国家的同质性,而进步主义话语框架则在建构相互依存情景上发挥更大作用,三者共同内化了集体身份中的“群我”关系,并通过核心话语的加乘,形成集体认同的群体选择,为“污名化”中国提供了认知框架与价值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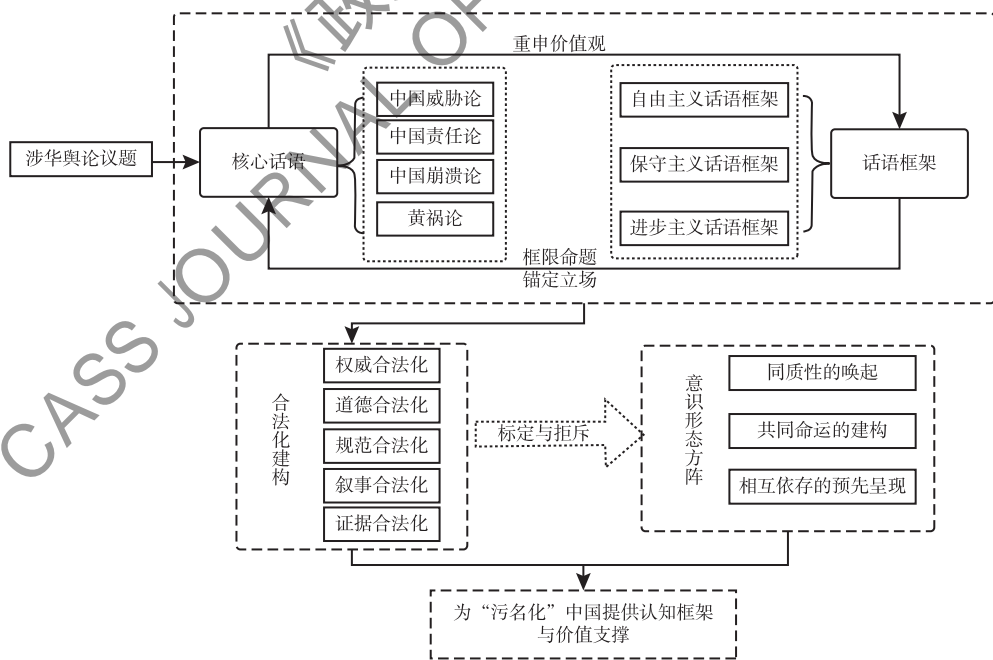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

① 宋伟:《国家认同与共有观念——对社会建构主义核心概念的反思》,《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

五、结语

从话语理论视阈来看,国际政治冲突的核心之一是价值理念的博弈,而舆论会以特定的方式介入其中。本文通过核心话语和话语框架分析这一介入过程,解析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逻辑。可以发现,国际舆论中的议题及论调实质上源于观念的博弈。话语框架以一种“认知无意识”为行动者提供认识世界的视角,同时也作为话语的观念诠释体系为核心话语提供价值观支撑。可以说,话语框架起到框限命题、锚定立场和情感动员的建构作用,核心话语只有依附话语框架才可以实现合法化建构。作为价值观的重现和强化过程,核心话语和话语框架的互构过程推动着集体身份的确立,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形成有利于话语主体的国际关系和权力分配。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基于价值认同组成的国家,尽管其内部意识形态充满矛盾和裂痕,但通过三种话语框架,相关核心话语却展现出一致的“自我”与“他者”的对抗,构造出一个隶属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试图将中国置于美国乃至世界的对立面,以支持美国国际话语权的正当性。

美国涉华舆论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合法化“自我”和非法化“他者”的过程,合法化与否的判定主要体现在是否符合话语框架背后的价值观念。美国在建构“他”“我”对立的核心话语时,就已经在通过话语框架的价值判断塑造“对手”。因此,中国要与之进行有效的话语竞争,就不能跟在对方设置的舆论议程后不断自证清白,陷入对方设置的“话语陷阱”。我们应该认识到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的核心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认可的话语框架提炼出中国的核心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也要基于中国建设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基于更丰富的价值模型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元的话语框架,从而推动国际话语权的公平分配,而这也是值得政治学者继续深入研究的论题。

作者:汤景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市,200433)

史金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省广州市,510632)

(责任编辑:林立公)